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李梓新：38年之后，我带知青爸妈重回海南

38年前，父母搭乘的那艘从汕头出发的轮船，时间是刻意安排的，经过香港时一定是半夜时分，这样即使有人跳海叛逃，生还机率也不大

特约撰稿人 李梓新 发自海南省东方市 | 2017-09-15



当时分别只有23岁和20岁的父亲母亲，从广东省的汕头港乘轮船到海南，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沟，种植橡胶。一待就是十年。他们没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胶的铁圈。图：Tsengly / 端传媒

海南省东方县高铁站，和中国所有新建的高铁站一样，到处崭新却缺少一些历史的味道。周围还有不少荒草和黄沙，正对着站前广场的地方却不出意外地竖立着高层住宅公寓。

2017年3月底的一天，我带着父母和两位姐姐，在他们离开东方县38年之后第一次回来。父母是在海南相识结婚，生下了我两个姐姐；我也在海南孕育，回到老家广东潮州才出生。

1969年，108名潮汕知青（编注：知青，指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77年到农村工作生活的城市知识青年）从广东省的汕头港乘轮船到海南省的海口，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被宣布。我的父亲母亲被分配到海南岛西边的东方县。不过那时，他们还没真正相识。

潮汕人在东方县的八所镇，并不算是新来者。在那之前，已经有不少技术人员在八所镇工作。马化腾的父亲马陈术当时正在这里担任八所港务局副局长。在我爸妈抵达八所的两年后，马化腾在这里出生。据爸妈回忆，马化腾的家境优渥，他小时候已经拿天文望远镜当玩具，观察星辰。

不过，当时分别只有23岁和20岁的父亲母亲，还要从八所镇继续往东40公里，向更深入的黎寨而去。在那里，以“连”这种半军事化组织为单位，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山沟，种植橡胶。一待就是十年。他们没有“朋友圈”，只有割橡胶的铁圈。

我觉得，命运之手素来没有公平可言。



我的爸妈和在海南出生的两个姐姐。图：李梓新提供

船号一响，108人的命运随着机轮开动，再也没有回头路

从我记事起，“海南”就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高频词汇。

五十年前，年轻人的命运无从自我选择。偏于东南一隅的四线小城潮州，工厂学校同样停摆，“造反派”和“保皇派”乱斗。初中毕业之后便无法继续学业的父亲，跑去做了一段时间的筑路工人，又在社会上晃荡，美其名曰读“四川大学”，还得了一场肺炎。文革爆发后，他爱在大字报写一些“蝶恋花”的诗词，跟着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生活非常迷茫。

大父亲七岁的长兄正在读医，兄弟情感并不亲密。祖母早逝，祖父也管不了吃不饱饭又无处安放的父亲，于是23岁的父亲应征去当知青，比起很多十几岁的同伴，他成了老大哥。

母亲则是一个贫困家庭中最不受待见的三妹，她上有一个大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我的外公在1953年就跑到海南支援建设，每个月只能给妻儿五口人寄几块钱的生活费。母亲小时候差点被转送他人，长大后自然也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只能零星读些夜校。当知青的机会，对她来说是二十岁人生的一场破局，尽管当时她对海南一无所知。

船号一响，108人的命运随着机轮开动，再也没有回头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最终客死异乡橡胶树旁，再没能回到潮汕；有些人幸运得到机会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编注：工农兵大学生是那些在文革期间就读高校的学生），并且走上仕途，衣锦还乡。群体的命运从来遵循正态分布的规律，只是个体不能提前感知自己属于哪一部分百分比。

我童年的茶余饭后，基本都是在听父母讲述他们海南生活中度过的。那些苦日子，似乎有一种神圣的位置，仿佛是战士勋章般的伤痕，又似一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怀念。海南农场的朋友，到老年也是父母朋友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时候，海南对我来说无比遥远。事实上，它距离潮州的距离，和上海距离潮州一样，都是1200公里。当我长大读书继而在上海扎根之后，那个属于四五十年前的、隐秘的农场生活，更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回乡后深居简出的父母，海南也同样遥远，几次旧友组织的观光聚会他们没有去，身体的病痛越来越成为旅行的敌人。

直到今年三月，他们稍微动了去海南的心思。起因是姐姐看到了一个很便宜的海南旅游团的宣传页。于是，我站出来推动一把，怂恿他们说，不如我们自己去，这样才能回到东方农场里去，重新见证和怀旧。



爸妈站在海南省东方县城的高铁站前。图：李梓新提供

船上看香港灯火璀璨，随即想起，这是资本主义的恶

从潮汕可以直飞海口，当年坐船需要两天，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从海口再转乘环岛高铁，再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东方站。

再次踏上东方的土地，父母看似不太激动。大概因眼前的巨大变化，使过去的生活情景已经无从辨认。

留在东方橡胶农场的潮汕朋友前来迎接。其中有一位大秋伯，他已经82岁了，还是第一次到高铁站来。

大秋伯不属于知青群体，1951年他16岁就参军，1962年就从东北转调海南。他绘声绘色地讲起当年入伍的故事，细节清清楚楚。他儿子，一名农场的公安干警，说大秋伯平日常忘事，偏偏对自己的早年记得一五一十。

“1952年在揭阳，新入伍的一队士兵，中间有25个人被点出来，包括我。剩下的人都在凌晨出发，静悄悄地消失了。后来才听说，他们开赴了朝鲜战场。”大秋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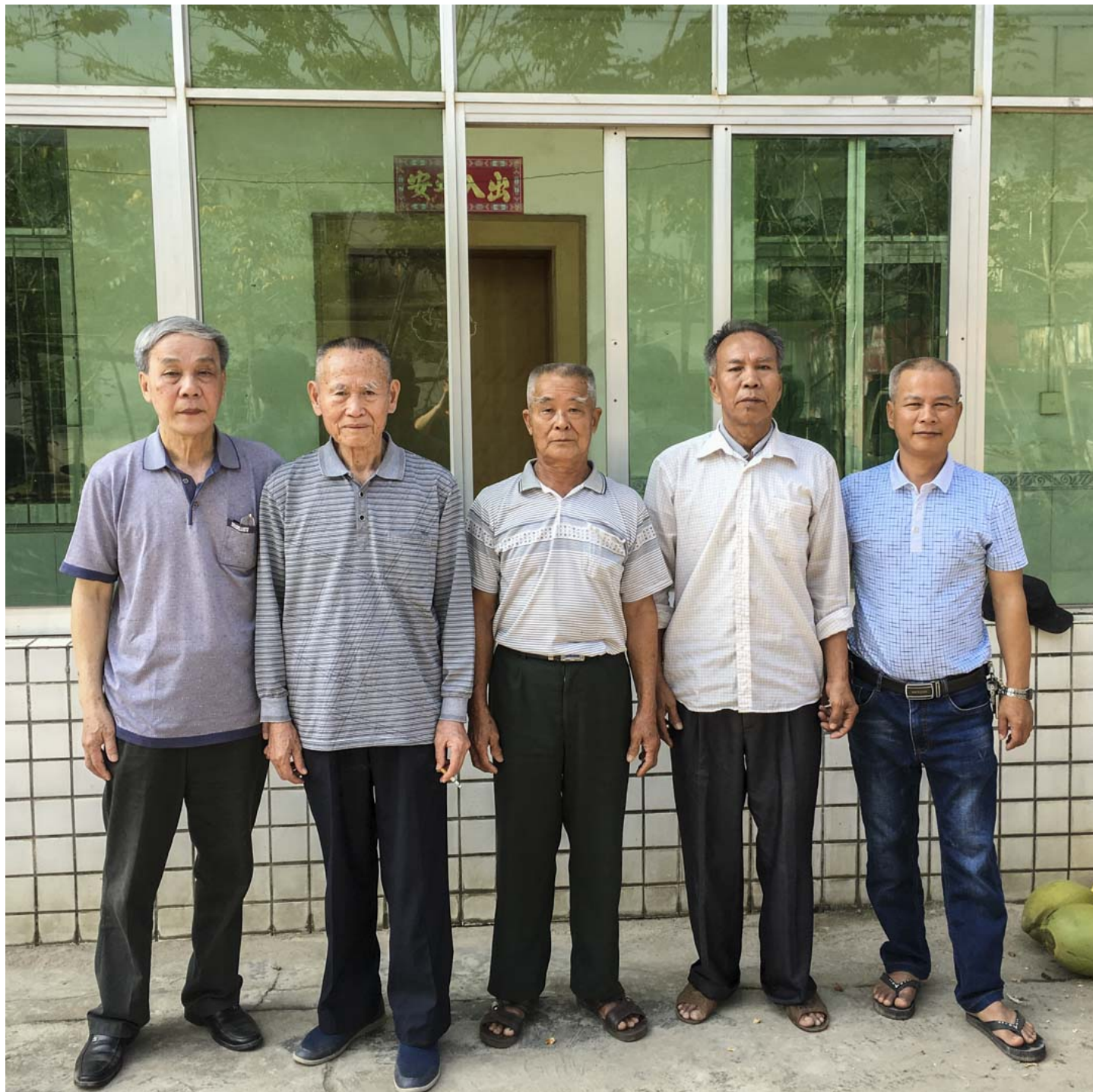
一艘海船载来的潮汕年轻人，和这些先期到达的潮汕人命运交汇。那艘从汕头出发的轮船时间也是刻意安排的，一定要使轮船经过香港的时候是半夜时分，这样即使有人跳海叛逃，生还几率也不大。小我父亲5岁的场友马锦成回忆道：看见香港灯火璀璨，漂亮极了，但是心中随即想起，这是资本主义的恶。后来，他曾担任潮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经常率团参观欧、美、日诸国，还有著述问世。

我想象中，和香港对比强烈的橡胶农场，虽然不像美国西部农场那样辽阔，但也会有连片的田野和土地吧，或许还有围栏？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

从东方高铁站出来不远，拐上东方大道一直往东，一路都是寻常市镇的模样，各种盒子状的住宅楼，往乡下走有一个个小市集。下班时分，马路两旁摆着各种小摊贩，不太新鲜的猪肉搁在太阳下面的案板上，和马路的烟尘混在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建设，使中国各地都一个样子。父母心目中的怀旧圣地，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庸俗平常的小镇而已。

当然，小镇的生活比农场时代肯定更为便捷，也更有利于个人发展。



我的爸爸和旧友在海南合照。图：李梓新提供

当年领袖的大手一挥，众多青年便成了乌托邦的实验品

有一些没有选择回潮汕的潮汕人，在今天的东方也过得不错。

混得最好的是李武艺、李武汉两兄弟。他们做香蕉贸易，一斤香蕉加上运费到上海大概一两块钱，可以卖出每斤四五块钱的价格。这些年下来，李家盖了四层小楼，开个小旅馆，还在加盖一栋房子扩大规模。他们的孩子在广州和深圳工作。

我们在李家兄弟的小旅馆住下，格局有点像我在台南住过的民宿。板床有点短，我身高不足六尺，躺下来，脚却伸到床尾边缘了。

这一次我带上了1岁半的小女儿。她是我们家族的第三代，懵懂无知，天真可爱。我的两位姐姐当年在海南的土地上，就像她今天一样。

小镇并不宁静，凌晨五点，窗外不断有大车呼啸掠过。一个繁忙的小社会，和父母当年封闭宁静的农场，有了质的不同。

这里的阳光有点东南亚的气息，三月已显燥热。当年的领袖大手一挥，众多青年便成了乌托邦的实验品，投入这本来和他们没有半点干系的土地，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抛在这里，别无选择。荷尔蒙和热血在这里跳跃，像是一场无法知道结局的长期野营。

东方农场的各个连队散布在丘陵和平地之间。我们穿过橡胶林去往母亲劳动了四年的五连。

橡胶树比我想像的瘦弱，据说要种下十年以后才能产胶。母亲小心翼翼地踏过小沟和草丛，和父亲一起站到了橡胶树边。她说，这里面应该有我种下的树。

到了五连，只见一个寂静破旧的村落，一侧是废弃了的平房，另一侧是二层小楼，还有人住着。母亲想去看看自己当年住的六人间草房是不是还在，答曰之前的草房已经推掉了，现在的人是十几年前从四川搬来的，不了解之前的情况。

母亲在五连呆了四年多。第一年的春节，她请假跟着运木头的大卡车跑到海口去找外公。因为不太好意思去打食堂的“忆苦思甜饭”（编注：“忆苦思甜饭”一般是春节或其他节日时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饭由粗劣食材做成，有时甚至会加入树叶、草根和泥土，为了让城市青年体会劳苦大众的生活），还被身为食堂厨师长的外公在除夕夜教育了一通。

正月刚过不久，回到农场的母亲就接到噩耗，在“一打三反”（编注：是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中，外公被指控贪污，悬梁自杀。

外公究竟是不是自杀，至今是悬案。没有一位亲人见到他最后一面。母亲的悲苦可想而知。幸好她碰到了我父亲。

结婚后，她和我父亲一起住到场部。场部就是整个橡胶农场的中心，依山而建，既平坦而又有气派。父亲在四连劳动了半年，便被提拔到场部，担任政治处干事，负责农场的保卫和刑侦。总体上农场还算风平浪静，但他也曾在半夜出去抓捕罪犯。

我记得父亲就经常说母亲是一个只懂埋头苦干的人，所以总是工作最多、机会最少。父亲也是老实人，但他有文笔不错，能写材料，也能抓得了犯人，所以不用太多下地劳动。当然，父亲算不上一个获利者。他没有被选上工农兵大学生，没能继续接受教育，至今算不上混得好的那一批人。

母亲说，当年4岁的大姐就能在场部里自己去打饭，认得自家的饭牌，不怕邻居家的高头大鹅与海南火鸡。有一些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今天大姐仍然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主要组织者。

只可惜这些记忆只能留在脑海。今天的场部已经翻新建设成一个器宇轩昂的镇中心。父母和姐姐住过的平房被推倒重建。领导们的小别墅建在不远处。



我的爸爸和当时农场保卫科的一些同事。图：李梓新提供

从下乡到下岗，父母这代是整个社会里上升通道最为匮乏的一代人

十年倏尔。

1979年，当政策放开、松动，知青可以返城之际，父母也随大部分人一起回乡。沉甸甸的海南木材家具通过海轮运走，这个家从这座岛屿连根拔起，渡过琼州海峡，跨过南中国海，回到了潮汕。

回来，是对一个传统大家庭的重新耦合和再度独立。李家祖上是一个做抽纱生意的大家族，后来家道中落。子孙还有七房，每个家庭在改革开放破土的年代，都有各自的动向和发展。

回城之后，父亲子顶父职，到了国营企业。母亲成为一名计件的缝纫工人。加上刚出生的我，一家五口人从四合院里6平方米的小房子从头开始。直到6年之后，父亲的单位分了房子，我们小家庭才告别了大家族，开始了独立生活。

再过了7年，国企下岗（编注：“下岗”是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工人失去工作）大潮袭来，父母的生活又经历了新一轮浮沉。

从下乡到下岗，父母这代是整个社会里上升通道最为匮乏的一代人。他们只能一直挣扎在一个平面上，奋力保持小家庭的温饱。他们年轻时没有经历房价的飞涨，也从未奢望有优质的私立教育提供给自己的孩子们。

然而，他们的孩子从懵懂的小城少年，开始有机会去往更大的城市，对父母在动荡年代形成的生活哲学有的深埋到自己体内，有的革新反叛。生活的轨迹伸得很远。

在我漂泊的这些年，我曾经带爸爸在2008年重回到1968年的天安门广场。去过他们曾在船上眺望过却从未停靠的香港。我想为父母观察自己的青年时光提供多一种维度。那几乎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让他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过多的动荡让他们的物质欲望很低，只求孩子工作安稳，家庭幸福，而自己宁愿在小城中平静度过晚年。

我内心希望，这一次我们重回在海南，回到原点，是一种时光印证，是生命的重新确认。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恸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胡清心：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时间点相遇

我无法想像现在来港就读的陆生是否还能保持我当年的心境，对他们而言，来到香港是进入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场的最前线。

异乡人：一场婚姻，他们抗争了七年

“台湾有这么多男人你不嫁？偏偏嫁一个西藏人，给我们制造麻烦？”受盡各方质疑，就是这场台藏婚姻必须承受的日常。

异乡人——胡清心：异议者的修炼，是坚持跟内心黑暗打仗

从保守右倾，到激进左倾，再回到更坚定的保守右倾，是不少陆生不愿提起的心路历程。

异乡人——陆颖鱼：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嫁到台湾后，香港女生陆颖鱼离开了媒体业，一番折腾摸索，今年才在台北巷弄里开了书店“诗生活”，对于她，香港人梦想中的台北是什么？

异乡人——夏目目：抱歉，我要离开香港了

在中产家庭作为（叛逆的）既得利益者长大，我来到香港家具都没买齐，就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社会运动，目眩神迷。